

正视现实,研究现实

Facing the Realities and Studying the Realities

启 言

读了本期王则柯先生《试论全社会按劳分配的不可能性》一文后,颇多感想。它再一次提醒我们,面对飞速变化的社会,理论跟在现实后面亦步亦趋,或仅仅满足于充当解释工具的现象实在不能继续下去了。否则,知识分子在这个变革的时代,何以立言、立身,又何以走向社会,走向世界呢!

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为起点,14年来我国学术文化探讨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发展阶段:对极左思想的批判;引进西方学术文化;80年代中期兴起的文化热;近两年出现的传统文化和新儒家研究热潮。

但如果回想一下十年动乱时期文化专制主义恶行之下一片荒芜的惨景,我们完全有理由为现在文化的日渐繁荣和多样化而欢欣鼓舞,拍手叫好。如果不回避严峻的现实,俗文化、商业文化大行其道,学术文化滑坡,主导文化虚设,以及惶惶然不知如何自处的知识分子,就不能不承认,文化危机的兆头已经显现。为什么在种种繁荣迹象之后却紧跟着危机呢?究其原因,理论界流行的脱离现实,逃避现实,曲解现实之风,恐怕是最主要的根源。

一是唯书是从。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或命题当作不可更改的圣谕,硬要用理论来规范现实,将理论凌驾于现实之上,而且还常常以正统自居,视新思想如恶魔。比如,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不知出了多少个版本,可是彼此大同小异,如出一辙,其中不乏空泛的内容。拿按劳分配来说,现实的分配格局早已是多样化的了,珠海西山区区长钟华生提出按效益分配说,其中资金、信息、技术,乃至社会关系都是参与分配的要素。现实生活的例子就更多了,石化部门的日子就比教育部门的日子好过,机关的住房就比企业好得多,脑力劳动的价值也不象马克思所说的是体力劳动的几倍,体脑倒挂处处可见。现实就是现实,尽管它们不符合某些理论信条,尽管它们在许多方面甚不公平,但我们总不能以抹杀现实来牵就理论吧!类似的现象在哲学、伦理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教课书和学术著作中屡见不鲜。这样的理论当然不可能对现实生活

作出实事求是的解释,更不用说指导实际活动了。相反,还造成了诸如言行不一等种种流弊。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力也必然随之枯竭。在许多方面,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还不如西方人就是证明。

二是唯洋是新。改革开放之初,西方思想一度是思想解放的一支劲旅,然而现在却给人以繁杂和疏离的感觉,原因也在于它们和我国当前的社会背景有相当的差距。诚然,国外许多理论和研究方法的新颖性和科学性令人赞叹,但从我国实际看却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因为就象在技术引进中要考虑适用技术一样,在学术文化译介中也应该考虑“适应文化”问题。以国外马首是瞻,跟着国外流行趋势转,往往既无法系统地把握人家的思想脉络和精神实质,还极易使人忽视现实重大问题,仅仅满足于纯学术的自我陶醉。比如这些年来,弗洛伊德、萨特、尼采都曾风行一时,但多局限于学术界和青年学生,且大多雨后地皮湿,未曾产生长久的印象。再比如,就在我国科学、民主还很稚嫩,人民的科学意识和民主观念亟待加强的时候,前些年又冒出一个“新权威主义”,令人无所适从。因此,在对西方学术文化的引进和研究中,应当重点提倡和关注国外处于类似于我国当前社会整体发展水平阶段时,其学者们的优秀研究成果,以贴近我国实际。

三是唯古是归。传统文化热的兴起,一方面是由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学术文化思想都无法圆满地解释、解决、指导现实生活;另一方面,传统虽历经批判,有些仍根植于人们内心深处,并在人们实际的社会行为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再加上近年来政府的积极支持,结果是差不多所有的古典名著现在都有了相应的白话译本,诸如《四书全译》、《庄学辞典》、《新儒家丛书》纷纷亮相,方兴未艾。沿着民族文化之根,人们似乎寻找到了某种归属感、自豪感和认同意识。然而,同时却又简单地、空泛地将世界上某些最先进的科学文化归之于久远的古籍之中。比如,有人说《易经》包括了现代科学的最新理论和概念;也有人断言,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的世纪。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种盲目自大

和自悲的混合物。尽管传统可以增强凝聚力,维持社会稳定,不过从促进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角度看,扬弃传统却势在必行。大而言之,传统文化是封建时代的产物,与我们所要确立的市场经济体制格格不入;传统文化的道德至上与现代社会的法律至上的观念也相去甚远。小而言之,以血缘亲情为特征的人际文化造成了人际紧张和相互依赖两重困惑。因此,新文化的建设不应以传统文化为本位。只有在活生生的现实政治、经济、文化中去发掘,去选择,新文化的发育和成长才有可能。

什么是现实环境?目前而言,有三个方面:在社会体制方面,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在经济科技文化方面,我们必须学习借鉴国外一切有用的东西;在日常生活领域,传统依然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同时,这三方面也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三个维度。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西方学术文化、传统文化,在不断变动的社会环境推动下,将会产生融合、矛盾、消长,新的学术文化也将在这个过程中显现。而学者们的任务就是从理论上作出剖析、对比,推动创造

性的综合和探求。

众所周知,学术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取决于政治宽容度、文化需求、学术环境、学术队伍素质诸多因素,不能一蹴而就,或许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但是,我们的学术理论要想真正具有生命力,真正具备独立、客观、超前的品性,确实担负起引导大众和社会批判的责任,那么从现在起就必须坚定不移地确立起以现实为本位,以现实为出发点的研究取向。可以说,除此之外,真正的文化繁荣是不可能的。这种取向似有以下三个方面:

1. 首先将那些被社会实践和社会现实证明是错误的理论教条从教科书和学术著述中剔除出去,不管它们听起来是多么美妙动人;

2. 从现实中提炼研究课题,从多角度作开放性的分析研究,以图作出局部或整体性的理论概括,进而确立新文化的基调和主体思想;

3. 在此基础上,学者要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利用各种大众传媒影响民众,批判抨击腐朽思想和社会弊病,使理论走向社会,使学者与人民共命运。

(上接第64页)

的努力首先将高粱品系“3—1”诱变成四倍体,为了提高结实率又将不育系“3197A”及其保持系“3197B”诱变成四倍体。通过高粱三系(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诱变成的四倍体,用配制四倍体杂交种的方法提高四倍体的结实率;在1983年首先获得了结实率高达95.5%的四倍体杂交种。

为了克服“四倍体3197A”不育性不够稳定的缺点,后又将不育系“Tx622A”及其保持系“Tx622B”诱变成四倍体,在1985年获得不育性完全稳定的四倍体“Tx622A”不育系,再加上生产上应用中的多个恢复系的诱变成功,实现了四倍体的三系配套。配制的四倍体杂交种“四Tx622A×四3B—15”等结实率在95.5%以上,籽粒大而饱满,蛋白质含量一般都在13%以上,已接近生产应用。

在选育四倍体三系的同时,还对四倍体的细胞学进行了研究。较深入地探讨了四倍体的染色体行为与结实率的关系。这些研究为进一步改良高粱及其它作物的四倍体提供了理论依据。

上述研究结果,在国际上首次提供了四倍体三系材料,利用三系材料配制四倍体杂交种显著地提高了四倍体的结实率。这在国际上是一项明显的创新。对改善现有高粱品质及其它作物的多倍体育种都具有重要意义。

智能美术图案研究深入到立体感领域

(图见封二)

浙江大学潘云鹤教授主持的这一研究项目,主要研究人工智能技术和CAD技术结合的智能CAD方法,并探讨设计知识的表达、形象思维的模拟、智能图形显示技术等一系列新的思想与方法。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一个实

用美术图案创作系统。

这项研究是由国家科委资助起步,1984年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使研究从平面效果深入到立体感领域。

美术图案创作系统由知识编辑、图案创作、色彩设计、交互修改等子系统组成。设计师通过知识编辑子系统不断输入素材和设计知识,充实和完善素材库和知识库内容。图案创作子系统能按照设计要求,自动选调所拥有的素材和知识,综合出图案,再由色彩设计子系统对图案赋色,必要时还可用交互修改子系统进行修改。系统还具有放大、缩小、旋转、组合、自动对称和自动分色等功能,以最终取得预期的效果。现在它已用于我国的地毯织造、墙纸生产、纺织印染、刺绣设计及室内壁画等多个行业,有显著的经济效益和国际竞争能力。

1985年本系统代表我国计算机应用水平,参加在日本筑波举办的国际科技博览会,美国著名计算机科学家H. A. Simon教授参观后写下:“迄今为止,这是我见过的最激动人心的计算机美术研究”。后又应加拿大邀请,参加世界计算机美术展览,并到香港、法国、美国、波兰等国家展览和举办讲座,均获得好评。

本项目所提出的关于艺术设计构思的形式化方法,为计算机模拟形象思维过程作了一次成功的尝试,它所使用的图样适合性变换及伪三维显示的算法,对计算机图形学的智能化有一定启发。

1990年起本项目理论研究部分列入“863”智能计算机项目。